



汤一介集

第七卷

面对中西文化



汤一介集

第七卷

面对中西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汤一介集/汤一介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300-18397-8

I. ①汤… II. ①汤… III. ①汤一介-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2706 号

汤一介集

汤一介 著

Tang Yijie J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256 插页 51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 114 000	定 价	998.00 元 (全十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自序

回顾百多年来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化（中学）在西方文化（西学）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全盘西化”（或“全盘苏化”）占尽上风，甚至“打倒孔家店”成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标榜“进步”的口号。可是在这种艰难的“中学”日衰的情况下，中国仍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一方面坚忍地传承着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守护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又以开阔的胸怀吸收和融会着“西学”的精华。他们深信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不会断绝，自觉地承担着“存亡继绝”、复兴中华文化的使命。因此，正是由于“西学”的冲击，使得我国学者得到了对自身文化传统自我反省的机会，唤起了中国学人的“文化自觉”。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取什么，因而在这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条件下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正如罗素所说：“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①

在本卷中的第一部分“转型期的中国文化”，我主要考虑的是中国文化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及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百多年来，在中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我提出中国文化应该从“中西古今之争”向“会通中西古今之学”转变，因而一方面我努力寻找“中

^① 《中西文明的对比》，见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14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引文略有改动。

西”、“古今”问题的可结合之点、可互补之处；另一方面我探讨在文化变革的过程中，文化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合力才是文化真正得以发展的动力。因此，我考虑到应该特别注意把“西学”这一与“中学”十分相异的学说作为参照系，如此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定会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此，我组织众多学者撰写了一部《20 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现在我把我为这部书写的“总序”收入本卷中，以说明“西学”是如何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影响以及应该如何使中国文化以新的面貌走向世界。

本卷第二部分“文化热后的反思”，主要收入的是我在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所思考的问题。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关注文化的热潮，出现了多种对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路向，但是那场“政治风波”把这一多元趋向的“文化热”的势头打断了。我注意到，《光明日报》曾发表了一篇《多元化就是自由化》的文章，我认为必须对这个十分错误的论说作点回应，不过我没有正面批判这篇文章，而是从两个在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出现的学术流来说明文化的多元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促进文化健康、合理发展的必由之路。“后现代”思潮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进入中国，但没有对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什么重大影响。但那场“政治风波”以后，“后现代主义”却在中国大为流行起来了，这是为什么？盖“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所针对的是要消解现代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多种难以解决的矛盾提出的，他们所作的是对“现代性”的解构，反对一元化，主张多元化，要求粉碎一切权威，使“现代性”的权威性和宰制性黯然失色。中国的一批学者注意到“后现代主义”这种反对一元化、主张多元化的特色，而对“后现代”的解构性不断进行研究，并加以提倡。这一针对性是十分明显的。与此同时，“国学热”在燕园悄然兴起。这一思潮对中国社会各界逐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预示着中国人的一种

“文化自觉”，强调自身文化的主体性，追求把中国文化的发展扎根在自身的文化基础上。因而，我十分关注这两种思潮在我国的走向，并写了一些相关文章，收入本卷“文化热后的反思”中。

本卷第三部分“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可以说对前一部分“文化热后的反思”的扩展。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我认为他的“文明冲突”的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于是我写了一篇《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发表在1994年《哲学研究》第3期中。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用儒家的“和而不同”等观念批评美国的“霸权”。此后，我对文化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写了不少文章。

本卷第四部分“跨文化对话的意义”，主要论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对话与交流中必会对双方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意义。其中《论中西文化在真、善、美问题上的比较》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中，原题为《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它是《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84（4））的续篇。在这篇文章中，我把老子、孔子和庄子的思想与西方的黑格尔、康德、谢林的思想进行对比，在“结论”部分，我提出西方哲学主要是要建立一完满知识系统，而中国哲学则是在追求一种内在人心的精神境界。

本卷最后一部分“思想、信仰与文化”，包含着我当时对“现实文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感受，例如，我和法国地理学家艾克沙维·李比雄院士的对话，表现出了中外知识分子的苦恼；在与法国大儒汪德迈的对话中，我也提出对《周易》系统的一种新解读。我的解读是否能成立，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汤一介

2012年12月5日

目 录

转型期的中国文化

如何发展中国文化	3
“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结合	
——对发展中国文化的设想	7
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	21
论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合力	24
转型时期中国文化发展问题	51
展望 21 世纪的文化发展	63
略论百年来中国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	66
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中国文化	75
“文化自觉”与“问题意识”	128

文化热后的反思

“现代”与“后现代”	139
“国学热”的悄然兴起	150
“文化热”与“国学热”	159
反思中的西方学者看中国传统文化	165
经济发展仍需提倡奉献精神 and 道德责任意识	168

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

文明是什么？	177
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181
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	190
“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195
“体用同源”：多元现代性阐释的新视角	215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	221
当前中西文化交流与会通	233

跨文化对话的意义

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研究比较哲学、比较宗教

学的意义	243
论利玛窦汇合东西文化的尝试	274
论中西文化在真、善、美问题上的比较	289
文化的双向选择	310
在有墙与无墙之间	
——文化之间需要有墙吗？	320
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327
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两种危险	340

思想、信仰与文化

文化的抢救、保护与创新	349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352

如何面对人类的痛苦？

——今天人类的痛苦和二千年前相比是

增强了还是减弱了？ 357

谈中西文化的互补性 364

附录一 文化热后的反省

——访汤一介教授 393

附录二 否定普世价值无法建设现代社会 402

面对中西文化

转型期的中国文化

如何发展中国文化

我想有三个问题构成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总问题。

(1)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传入中国，到 20 年代至 40 年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有几次论战，即所谓“东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等，这些争论到抗战后没有深入下去。今天，我们如何对待这一问题？从什么方面研究它？从中国历史看，外来文化传入中国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 1 世纪印度文化（主要是佛教），第二次是 17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欧洲基督教文化，第三次是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出现过什么问题呢？印度文化的传入大体经历过依附中国传统文化（汉魏时期）、互相发生冲突（南北朝后）和最后融合（隋唐以后）这三个阶段，结果一方面是中国文化接受了印度佛教文化，另一方面印度佛教文化也有很大改变，作了许多变形。这样就出现了中国式的佛教——华严、天台、禅宗等，禅宗尤其明显地中国化了。及至宋明，就把佛教所能吸收的全部吸收了。至此，印度佛教作为哲学思想已不起作用了。

17 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输入也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17 世纪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与中国知识分子关系很好，他们想把基督教的教会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结合起来，如利玛窦用中文写的《二十五言》，很想把二者结合起来，但实际发展的结果不一样。从 17 世纪中叶以后，到康熙，一直是正常的。雍正时期发生了变化，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后被鸦片战争打破，中国被迫接受

西方文化。据西方教会的一些神学家讲，罗马教廷走了一个弯路，即强迫中国接受，强迫的结果使基督教文化远远没有佛教文化的影响大。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政治上适应了中国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一种结合，即毛泽东主席所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在文化上好像并未解决，或解决得不是很好。佛教的传入，中国是以开放的姿态来对待的，所以能把外来文化吸收到中国文化中来，或者说这是一条重要经验，即对外来文化要采取不拒绝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可以有两个提法：一个提法是思想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个提法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文化。哪一个提法是我们文化发展的前景，还很难确定。但这两种说法是相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在西方产生的，所以必须结合才有发展前途。

(2) 面对当前西方文化——其中包括西方各种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挑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引进西方技术，借鉴西方的经济企业管理等，但同时要不要引进西方文化？如要引进，又如何引进？这里可能牵扯一个问题：现代化不等于西方文化。这是两个概念，不能等同。西方的东西不一定是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从历史上看有两次教训：五四时期有“全盘西化”的主张，这种主张是无法行得通的，因此引起“本位文化”的抬头，出现了一个“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的大论战，一直论战到40年代。因此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或者会引起复古和“保存国粹”，或者会割断民族文化传统。割断民族文化传统，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价值？所以“全盘西化”是绝对走不通的，这里面不仅仅是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全盘学习苏联，大学的教育制度就是全盘学习苏联的结果。因此这次学习苏联，也不算成功。所以

要想人为地割断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的。“全盘西化”引出“本位文化”的挑战；全盘学习苏联引起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否定，结果优秀的文化遗产未得到继承，落后的东西却被保存下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西方，没有一个思想主潮，在英美分析哲学很流行，但越来越引起哲学界的不满，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等也都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兆头。看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世界文化将是一个多元的局面。只有从世界全局着眼，用国际眼光来看待和了解文化的发展，才能有广阔的前途。

(3) 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从总体上有一个历史的反思。正确估价自己的文化，才能正确解决面对世界挑战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简单概括起来，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其一，空想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儒、墨、道、法等各家各派，除庄子和杨朱外，都对现实社会非常关切，抱着热切的改造社会现实的理想。结果，不仅不能转变现实政治，反而美化了现实政治。这样一种空想的理想主义，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传统大大影响了我们。其二，人本主义思想的传统。中国的人本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从孔子起，就非常重视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和作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的“尽性知天”，《易经》讲天、地、人三才等，都十分强调人的义务和责任，而不大讲人的权利和独立人格。因此，中国人本主义讲人都是限制在“五伦”关系中讲的，把我们的价值在对方实现，重视人的地位是从义务、责任方面讲的，这一点对我们影响也很大。其三，求统一、求和谐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多讲“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等，这种求统一、求和谐的思想，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所以对事物的观察往往是没有进行分析的总体观。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我们的科学从古代向近代的发展。有人认为元气论接近量子场论，《周易》中有二进位的电子计算机原理等，我认为

恰恰是原子论而不是元气论能发展到近代科学，原因是元气论是一个没有经过分疏的总体观。我们的思维方式有缺欠，所以传统哲学没有建立起系统论和逻辑分析理论。而我们的认识论又往往和道德论结合很紧，讲认识的目的是要让人实现道德。其四，直观的理性主义或道德直观的理性主义。从孟子开始一直到宋儒，都强调反省和自我认识。认为认识了自我，就认识了宇宙，而认识自我，又必须从道德的角度。所有这一切都要有一个历史的反思，找出问题之所在，而不能是一味地贬低它或吹捧它。

原刊于《瞭望周刊》(海外版)，1986-02-24

“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结合

——对发展中国文化的设想

当前，国内外许多人都在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这一情况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有我国国内的原因，而且也有国外的原因。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看，在纵、横两个方面都可以看到，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这个大时代的迫切要求。

就纵的方面而言，也就是从历史的发展到中国的现状而言，我国正处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段。五四运动以来，现代化的口号提出了半个多世纪，而现代化的进程却一次又一次被打断，这是什么原因？看来也许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现代化不能只限于科学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应该与文化深层的现代化相配合，其中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反思等等。“现代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就说明我们仍处在“非现代化”的历史时期。那么首先有一个“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其间就包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念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和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所以在现代化问题上不能取捷径，不能仅仅在自然科学方法等浮面的文化现象上做文章，而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对文化深层的内容作深入的研究。回顾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提出“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来，就存在着一个所谓“古今中外”之争。“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的争论从五四运动前后一直延续到三四十年代，问题没有解决，后来竟搁置起来了。这里面是否有一个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相

混淆的问题呢？看来“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都是不对的，都无益于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这个历史发展的纵线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估价，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等问题，被人们提了出来。

就横的方面来看，香港的回归问题，使我国面临“一国两制”的现实。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并存于一个国家，如何才能长久、稳定地保持下去，这也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能对此问题作出符合历史发展的处理，需不需要有一个观念形态上的基础？如果对此问题作否定的回答，那么对此问题作出符合历史发展的基础将如何得到保证？看来，我们必须考虑从某一方面找到一个“观念形态上的共同基础”，这个观念形态上的共同基础应该而且只能到某种共同的文化层面中去寻找。这就涉及到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把握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不仅要当前文化问题作认真研究，同样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历史的反思。

正因为在这纵横交叉点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反思、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就具有了时代的意义。

如果把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放在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中来分析，将使我们更加了解其时代意义。就全世界范围看，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意识：一是“全球意识”，一是“寻根意识”或叫“民族意识”。

从前一方面看，由于全世界成了一个关系非常密切的整体，全世界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很多是共同的。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发生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密切关系。知识和信息的迅速传递，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很快就会得到传播。因此，对“文化”的发展没有一个全球眼光是不行的。我们必须随时了解各种新学说、新思想，思想文化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而正因为这种交流，各种学说、思想的互相影响也就会加强起来，所以